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四編

林慶彰主編

第26冊

譚嗣同經世思想及其新政變法研究

趙世瑋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譚嗣同經世思想及其新政變法研究／趙世瑋 著 — 初版 — 新

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2+31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26 冊）

ISBN：978-986-322-036-7（精裝）

1.（清）譚嗣同 2. 學術思想 3. 哲學

030.8

101015392

ISBN-978-986-322-036-7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二六冊

ISBN：978-986-322-036-7

譚嗣同經世思想及其新政變法研究

作 者 趙世瑋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十四編 34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譚嗣同經世思想及其新政變法研究

趙世瑋 著

作者簡介

趙世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且兼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曾發表期刊論文“Yen Fu and the Liberal Thought in Early Modern China”、〈中國近代思想史「群」觀念之起源及其影響〉、〈譚嗣同師弟關係考辨〉；會議論文〈論戴震詮釋孟子思想之意義及相關思想史上之問題〉、〈試論晚清公羊學派進化思想之形成〉、〈蘇軾〈正統論〉及其時代問題析論〉、〈論晚清「以太」說之建構與作用〉、〈清代中晚期永嘉儒學發展略述〉、〈明清「浙學」概念及涵義重探〉，以及譯作〈全球倫理與中國資源〉(Gregor Paul)。現從事晚清思想及清代浙學等專題研究。

提 要

近代以來，學者對譚嗣同的研究著作頗多，討論的議題也具多樣性，但是整體的論述與理論邏輯的推演，卻相對較為粗疏，而在談論譚嗣同思想成因上，也多有忽略或缺乏明確論證。諸如學者偏重於討論譚嗣同哲學思想，而忽略其早年學術思想的內容與經學、史學對其思想形成的重要性；學者偏重討論《仁學》的哲學意涵，與譚氏思想究屬唯心或唯物的問題，卻忽略譚氏寫作《仁學》的目的與其中關注的焦點，並非全在哲學問題上；學者無法明確指出譚氏思想形成的來源究竟為何，只依據主觀判斷其受到王船山思想與湖湘學派的影響，卻無視於譚氏曾自言永嘉之學對其深刻的影響。此外，譚氏在戊戌維新時期與失敗後的種種作為，學界仍有許多紛紛之論，其原因不外乎譚氏究竟心中有無革命的思想，而文獻上的證據卻往往有撰者本身政治上的私人目的含混其中，如梁啟超所撰〈譚嗣同傳〉、畢永年的〈詭謀直紀〉等，致學者誤信其說，爭議遂起。

本論文即試圖解決上述學者研究上的不足與疏略處。全文概分為緒論、結論及七章：

緒論部分將海內外研究譚嗣同思想的重要文獻予以簡要評析，並說明本論文研究所關注的議題及所採取的學術取徑為何。

第一章：譚嗣同學問形成的過程。以譚嗣同的啟蒙時期為起點，逐步分析譚嗣同思想形成的幾個關鍵階段，同時釐清影響譚氏思想最主要的來源為何。

第二章：從〈治言〉到〈三十自紀〉的思想轉變。主要分別探討《石菊影廬筆識》〈學篇〉中的經學問題、〈思篇〉中的思想以及史論。另外對〈治言〉寫作的動機與內容的分析中來探尋譚氏思想發展的脈絡，並剖析完成〈三十自紀〉後譚氏思想轉變的契機。

第三章：甲午戰後至居金陵期間完成《仁學》。除深入探究影響譚嗣同深遠的經世事功思想外，譚氏寫作〈瀏陽興算記〉之後在湖南地區以及師友之間所產生的爭議，也詳加論述，並對譚氏最重要的著作《仁學》寫作目的，及著作版本問題進行剖析。

第四章：深入探討《仁學》思想，並就仁說、以太與氣、以太與仁、從以太到心力的轉化、政治思想、倫理思想及經濟思想等問題予以剖析。

第五章：金陵棄官與湖南新政的開展。從譚嗣同金陵候補知府時期，留心新政的推展，以及對《申報》和《時務報》的幫助、促成時務學堂的設立，之後選擇離開金陵回到湖南，成立南學會，並大力推展湖南新政，而受到守舊派和張之洞等人的彈壓，最後終因書院出題之事導致譚氏與歐陽中鵠師生關係決裂。

第六章：從奉旨入京到菜市口就義。分述譚嗣同戊戌北上後擔任軍機章京時，與康有為等人協助光緒推展新政的過程，以及譚氏密會袁世凱的始末，和譚氏選擇從容就義的經過，另外也釐清獄中題壁詩的疑點。

第七章：一生的評價，探討譚氏性格對其一生的影響，以及反滿、死君的疑問，並就對後世的影響加以說明。



目次

緒論	1
一、論題的建立	1
二、當前研究成果概述	2
三、現有研究的闕失及研究前景	6
第一章 譚嗣同學問形成的過程	11
一、譚嗣同的啓蒙時期	11
二、譚嗣同思想形成的關鍵階段	17
第二章 從《石菊影廬筆識》與〈治言〉到〈三十自紀〉的思想發展	25
一、《石菊影廬筆識》〈學篇〉中的經學問題	26
二、《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中的思想	44
三、《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中的史論	55
四、〈治言〉寫作與思想發展的脈絡	59
五、〈三十自紀〉後思想轉變的契機	69
第三章 甲午戰後至居金陵期間完成《仁學》	73
一、瀏陽興算所產生的爭議	74
二、譚嗣同的經世思想	83
三、《仁學》寫作目的及著作版本問題剖析	94
第四章 《仁學》思想探析	103
一、仁說	103

二、以太與氣	105
三、以太與仁	111
四、從以太到心力的轉化	117
五、政治思想	125
六、倫理思想	140
七、經濟思想	144
第五章 金陵棄官與湖南新政的開展	149
一、往來於湖南湖北及江蘇等地	149
二、湖南辦礦	159
三、《湘學報》與《湘報》	170
四、時務學堂事	176
五、南學會	187
六、湖南保衛局與團練	192
七、改時文事件	199
八、湖南新政失敗原因	205
第六章 從奉旨入京到菜市口就義	215
一、戊戌北上	215
二、入值軍機處	220
三、圍園密謀與戊戌政變	224
四、戊戌政變肇因	242
五、獄中絕筆及題壁詩	249
六、戊戌變法失敗原因	256
第七章 一生的評價	267
一、譚氏性格	267
二、死君與死事之辨	268
三、對後世的影響	279
結 論	281
重要參考文獻	285
一、清代以前輯著之文獻資料	285
二、近人專著及論文集	291
三、近人外文著作及中譯著作	298
四、中文碩博士論文	301
五、中文期刊論文	302

緒 論

一、論題的建立

直至今日，以譚嗣同為範疇的直接或相關的研究，雖已有許多篇卷，但仍有不少待澄清、開發及解釋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目前的研究論著中，卻相當罕見。就本文論題而言，研究譚氏的思想內容已有許多成果，但是相對的，譚氏從中國古籍的探研過程中所產生的學術觀點，研究者卻寥寥無幾。彷彿譚嗣同自寫出《仁學》一書後，他的思想發展也就完成了。因此，學者關注譚氏思想的焦點，自然也就莫此為甚。然而譚氏一再表明：「近依《仁學》之理衍之，則讀經不難迎刃而解，且日出新義焉。」（《全集》頁 262～266）且《仁學》中對經書的詮解，所在多有，這些都是譚氏在撰著《仁學》之前，對古籍鑽研的成果展現，甚至可以說譚氏《仁學》的寫作目的，有部分就是為了解決經書中的詮釋疑義。

職是之故，本文撰寫的目的，就在於通過對譚氏學術思想及經世作為的表現，尋繹一條溝通譚氏早年至《仁學》撰寫完成，以及後來譚氏變法思想與經世實踐的線索，來重新審視譚嗣同思想上的特點。如此，才可能對譚嗣同的研究具備完整性。

當前學界對譚氏思想發展的脈絡，多半未詳細掌握，因而往往產生如此的誤解：將譚氏維新改革思想放大到從早年甚至幼年即逐漸形成，這與譚氏自稱早年彈抵西學，深懷夷夏之防的觀念不免相牴觸。如此一來，對譚氏的思想研究，甚至評價譚氏的一生，都顯得極不客觀，常見的情形，乃成為研究者的「譚嗣同研究」。再者，早期研究譚嗣同的學者多半採取社會主義觀點

來批判譚氏的思想，也不免將譚氏思想裂解支離。爲避免如此的研究取徑，「新史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把過去重要時代的文化整體重新復原。我們衡量某個時代一個事件或一個方面的重要性的標準應該是當時的標準，而不是寫歷史人的時代的標準。」〔註1〕則是值得引鑑的方法。「新史學」的研究注意到「任何單一的原因，都不能決定歷史事件的進程。歷史學者對歷史因果關係必須採取一種試探的和經驗的態度，並且要接受多元的觀點。」〔註2〕應用在探討譚嗣同的思想與經世作爲上，是值得嘗試的一種方法。

焦潤明在評析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實證史學時曾指出：「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思想問題的研究中應用實證方法，起碼要弄清楚如下幾個問題：某一特定思想是由誰最先提出來的？這一思想淵源於何處？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什麼刊物上，以什麼樣形式發表的？某一思想是怎樣傳播的？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等等，上舉的每一個問題其實都是需要實際證明的。」〔註3〕儘管蘭克的史學觀點和目的受到許多的批評和質疑，伊格爾斯即認爲：「蘭克那種狹隘地集中注意於與廣泛的社會背景脫節的政治史，過窄地著眼於歐洲列強的外交事務，過分倚重國家文件而對其他史料不屑一顧的『科學』的歷史研究模式，不僅對於德國啓蒙文學家寫一部包羅萬象的政治社會史的雄心壯志來說是一個倒退，而且也反應了這種研究模式產生時，19世紀早期普魯士大學的政治、社會和知識的侷限性。」〔註4〕但是蘭克的實證方法，在當前研究譚嗣同的學者中，採用此法的還是大有人在，且這種方法對於釐清譚氏《仁學》裡的「以太」和「心力」等觀念，及其在戊戌變法時期的作爲，反而更顯得客觀與重要。

二、當前研究成果概述

譚嗣同在近代中國歷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跡。即使在他逝世百年之後的今天，仍不斷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百年來的研究成果，堪稱豐碩。無論是基礎文獻資料的搜集、出版，還是對譚氏思想研究的推拓，這些工作到今天仍持續進行。1917年，上海文明書局發行了第一本鉛印本《譚瀏陽全集》。1943

〔註1〕 見 James Robinson:《新史學》（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187～188。

〔註2〕 同前註，頁206。

〔註3〕 見焦潤明：〈關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頁89。

〔註4〕 見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北京市：華夏出版社，1989年），頁9～10。

年，歐陽予倩編的《譚嗣同書簡》出版，為譚嗣同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史料。1954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譚嗣同全集》，系統地分類整理了譚嗣同的研究史料。同時，《湖南歷史資料》也發表了一批譚嗣同的未刊書信。1957年，楊廷福的《譚嗣同年譜》問世。之後，楊榮國的《譚嗣同哲學研究》、李澤厚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等論著相繼出版，形成了譚嗣同研究的良好趨勢。1981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蔡尚思、方行編的《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增加了近四分之一的研究史料。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時出版了由徐義君著作的《譚嗣同思想研究》和鄧潭洲的《譚嗣同傳論》。前者較系統地論述了譚嗣同的政治觀點、哲學思想及其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思想基礎；後者則先概述譚嗣同的一生，再就他的思想進行專題評論。1988年，湖南譚嗣同紀念館等單位編輯出版了《譚嗣同研究資料匯編》，補足了部分和譚嗣同相關的一手資料。1998年9月28日至30日在譚嗣同家鄉瀏陽市舉行的「譚嗣同暨湖南戊戌維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將譚嗣同的研究推進了一步。2004年湖南大學出版社分別出版了丁平一的《譚嗣同與維新派師友》和賈維的《譚嗣同與晚清士人交往研究》兩本專著。以資料和內容而論，後者的學術價值遠超過前者。

自1950年代至今，香港和臺灣報刊雜誌上發表了有關譚嗣同的文章已有數十篇，臺灣的碩、博士論文也有十一篇〔註5〕，其中較具學術價值的為林載爵的《譚嗣同評傳》和邱榮舉的《譚嗣同的政治思想研究》。日本學者一直對譚嗣同懷有濃厚的興趣，據粗略估計，從50年代到80年代末，日本學者就發表譚嗣同研究論文近40篇，其中，已有中文譯作的，如竹內弘行所撰〈譚嗣同的《仁學》和清末的仁思想〉一文，詳盡分析了譚嗣同所提的「仁」這一概念的內涵、來源及其對中國近現代思想界的深刻影響。他認為譚嗣同所持的「仁的人偶說」，是在清朝考證學者們批判宋學和復興漢學中所形成的，也是清末變法所共有的學說。〔註6〕此外，小野川秀美的《晚清政治思想研究·

〔註5〕可參見程克雅：〈臺、港及海外地區近五十年來的譚嗣同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04年第14卷第1期，頁131，另可查閱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註6〕相關研究可參見陳善偉：〈八十年來的譚嗣同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84年第15卷，頁139～151；鄭焱：〈譚嗣同研究述評〉，《求索》1995年第4期，頁113～116；李喜所：〈百年譚嗣同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頁77～82。

譚嗣同的變革論》、近藤邦康的《救亡與傳統——五四思想形成之內在邏輯・清末變法論與譚嗣同思想》、堀川哲男的《譚嗣同的政治思想》、有田和夫的《氣的思想・變法運動中的氣——附：以太》，以及坂元弘子的《譚嗣同的《仁學》和亨利烏特的《治心免病法》》，都提供了許多探討譚嗣同思想的不同面向。未有中文譯作的，如近藤邦康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81 年）、有田和夫的《清末意識構造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4 年）和《近代中国思想史論》（東京：汲古書院，1998 年）、佐藤愼一編，坂元ひろ子的《近代中国の思索者たち・譚嗣同——「万物一体の仁」の思想》（東京：大修館書店，1998 年）、島田虔次的《中国思想史の研究・譚嗣同の思想の性格》（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5 年）、坂出祥伸的《譚嗣同の「以太」説》，《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1974 年 12 月第 5 号）、李惠京的《譚嗣同の「仁学」——批判哲学としての破壊と建設の役割について》（《東方学》95，1998 年）、孫路易的《中国思想認識における幾つかの問題・譚嗣同の「以太」》（京都：明友書店，2006 年）等，更注意跳脫唯心、唯物論的爭辯問題，而著重在以往研究譚嗣同時所忽略的思想性格方面。

當代美國、加拿大學者對譚嗣同的研究，應屬 Nathan M. Talbott、Douglas David Wile、Ray Ronald Robel（羅貝爾）及篠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四位學者的博士論文為最完整且重要。最早較全面談及當代美國研究譚嗣同的論著，則是現任加拿大 Lethbridge 大學歷史系教授鄭兆江（Luke S. K. Kwong）在 1996 年出版的專著 *T'an Ssu-t'ung, 1865~1898: Life and Thought of a Reformer*。鄭兆江指出：「在中國以外地區，學者同時對譚嗣同有興趣則發生在 1950 年代。以美國為例，除去各種期刊論文不算，到 1977 年為止，至少有四篇集中討論譚嗣同的博士論文已經完成。」〔註 7〕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系教授陳善偉（Sin-wai Chan）在 1980 年出版的 *T'an Ssu-t'u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已詳盡地將三位學者的博士論文及其他學者的研究著述列舉簡介。此外，Lisa Marie Rogers 的博士論文 *Nature and Ethics in Late Qing Thought*，第三章也討論了譚嗣同的《仁學》；Ingo Schäfer 的文章 *Natural Philosophy, Physics and Metaphysics in the Discourse of Tan SiTong: The Concepts of Qi and Yitai*，以及 Richard H. Shek 的 *Some Western Influences on T'an Ssu-t'ung's Thought*，都偏重於探討

〔註 7〕 見 Luke S. K. Kwong, *T'an Ssu-t'ung, 1865~1898: Life and Thought of a Reformer*, (Leiden; New York; Köln: Brill, 1996), pp. 3~4.

《仁學》的哲學問題。

現有關於譚嗣同年譜著作，有楊廷福的《譚嗣同年譜》、譚訓聰的〈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和譚恆岳（譚嗣同在臺灣的嗣孫）編著的《譚嗣同年譜新編初稿》較為完備，其餘如徐義君、李喜所等都只有附錄式的行蹤表。《仁學》的評注本，以周振甫的《譚嗣同文選注》、加潤國選注的《仁學：譚嗣同集》及印永清評注的《仁學：走出不仁的中世紀》為最主要，但是譚恆岳編著的《譚嗣同仁學注釋析評》，卻較前三本更加深入與完備，可說是目前為止對《仁學》用力最深的著作。

在期刊論文及學術會議論文方面，中國、香港和臺灣已有大量的篇章，此處不再贅述，而值得一提的是，輔仁大學曾出版《仁學百年：譚嗣同仁學的回顧與展望》；譚恆岳等人也在1994年於臺灣成立「中華仁學會」，並且已舉辦過多場學術研討會，集結五冊的《論文集》，如中華仁學會主辦的《譚嗣同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先烈譚嗣同先生殉難一百週年譚嗣同暨戊戌維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主辦、中華仁學會協辦的《譚嗣同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許多關於譚嗣同的專論，也有部份收錄於田伏隆、朱漢民主編的《譚嗣同與戊戌維新》。

至於討論譚嗣同在湖南推行的維新新政，有小野川秀美的《晚清政治思想研究・戊戌變法與湖南省》、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1895～1898）》，以及尹飛舟據博士論文增修出版的《湖南維新運動研究》，Charlton M. Lewis 的單篇論文：The Reform Movement in Hunan（1896～1898），以及專著 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 1891～1907. 有部份章節極具參考價值。此外，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論光緒丁酉戊戌湖南新舊黨爭》，雖在許多文獻資料不足的情況下，撰述內容遭致陳善偉的批評，但其貢獻仍值得肯定。而討論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及政變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如鄭兆江的專著：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 及高田淳的《中国の近代と儒教：戊戌変法の思想》皆有其個別的詮釋角度。但其中最值得肯定的重要著作，當屬茅海建的《戊戌變法史事考》一書。茅海建的學術取徑極為類似前述的實證史學，充分讓文獻資料來說明歷史事件，也謹慎選辨非官方文獻，並且對孔祥吉等人的學術態度和論證多有批評。該書對釐清戊戌政變過程的原委，予人印象深刻。

三、現有研究的闕失及研究前景

本文研究所根據的一手文獻《譚嗣同全集》，雖是已經過編者增補了部分新發掘的史料的增訂本，但是仍不能稱之為「全集」。至少，許多重要的檔案文獻已經被銷毀、佚失或是尚待發掘。尤有甚者，《譚嗣同全集》所收錄的譚嗣同著作，有部分卻是需要再進一步加以考證，以確定其真偽。

戊戌政變發生之後，朝廷雖一再發佈諭令，將可能牽涉其中的官員、士紳，一律不再追究，但是當時仍有許多人為了避免日後株連而將珍貴的書信、日記等文獻銷毀。《宋恕集》卷十〈日記〉中即有編者按語，指宋恕「向來就有記日記習慣。但戊戌政變後，頑固派對維新人士大肆鎮壓，以致不得不於『己亥十二月二十、廿一兩日夜及廿二大半日』檢理一番全部日記和筆記，『當存者裁存，當摘者摘記，除裁存摘記者外，原本悉於廿二下午日悉付丙丁矣』。當日燒燬的就有丁酉、戊戌、己亥等年日記及其他簿冊十九本。……可見顧慮重重」。^{〔註8〕}居住在北京的顯貴，據說也紛紛將門房的來客登記簿燒掉。以和譚嗣同過從甚密的唐才常和梁啟超為例，在《譚嗣同全集》中可找到譚氏寫給兩人的書信，而在現今可見到的兩人的文集或全集當中，竟然沒有一封書信是寫給譚嗣同的！如此不合理的現象，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兩人都像宋恕一樣，將可能受株連的書信予以銷毀了。

狹間直樹在一篇談論譚嗣同的著作文章中，曾提到：「譚嗣同的《仁學》，以前為了宣傳其意義，被披上了康有為學說的外衣，而現在這件外衣卻由梁啟超自己將它脫了下來。……那麼，與梁啟超的關係又是怎麼樣的呢？本稿最初提示的7項內容，全部被刪除了。連顯示兩者特殊關係的比喻『程嬰杵臼、月照西鄉』都被刪除。這樣的話，就不得不使人對〈去國行〉的措辭抱幾分懷疑了。現在我還沒有探明這一疑問的解釋方法。」狹間直樹因而對梁啟超分刊譚嗣同的《仁學》一書的目的有所質疑，而更令人訝異的是：「這且不提，對於本稿來說，更為重要的是，譚嗣同的著作『皆藏於余處』的記載被刪除了，而且還被改成了『君死後皆散逸』一句。這只能說是『不可思議』的大轉換，雖然與《清議報》第85冊所載的廣告所說的內容相呼應，但是與在這之前的《清議報》上所登載的事實相矛盾。也許可以作這樣的推測，為了避開這一前言後語的矛盾，梁啟超將單行本拿到了《國民報社》去出版，而不是《清議報》館。」

〔註8〕 見宋恕著，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93年），下冊，頁917。

〔註9〕這是否就意味現行的《仁學》刊本是不全，甚至有部分並非譚氏原著？因為如果梁啟超否認當初譚嗣同親自交付的著作，那麼連在上海由唐才常刊行的《仁學》，原就是得自梁氏的副本，也可能有問題？

譚嗣同曾於戊戌六月十三日北上進京的途中，寫信給李閏說：「前在省托唐佛塵寄回書箱等件，其中皆是要物，想均收到矣。」（〈致李閏·二〉，《全集》頁531）「其中皆是要物」是否有《仁學》和其他師友往來書信？唐才常負責整理封存寄回，那麼他是否也曾抄錄一份《仁學》？譚訓聰在《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中曾記載：「先祖母（按：即李閏）於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九月初七日逝世，越年餘於祖母居室樓上，發現公遺物，用大小木箱數十件，又有用籐箱竹簍貯藏者。……竹簍中所藏計有六、七隻，多係刊物，計有《申報》、《時務報》、《湘報》、《湘學報》、《知恥報》、《知新報》、《農學報》、《算學報》等等，及英人丁韋良譯《萬國律例》、公演算草稿數十本（用毛邊紙毛筆演算）、英日文《字典》、《新約全書》，及當日所謂格致書籍。木箱中書有湘鄉曾國荃刊行之《王船山全書》，公親批點，蓋有『瀏陽譚氏復子讎書』篆文印。觀此可知公之嗜好與興趣。」〔註10〕這些木箱中的書籍遺物，應該就是唐才常整理寄回的。但譚訓聰卻沒有提到《仁學》一書。可是譚訓聰又記說：「先人手澤現無片紙存留，余家居時，發現一批信件，及會客門簿。除大東家信外，信札中有鄭孝胥、徐仁鑄、江標、王之春、陳寶箴、陳三立、丁惠康、熊希齡、梁啟超、陶浚宣、錢洵、張通典、龍璋、龍紱瑞、徐乃昌、左孝同、宋恕、黃遵憲、羅振玉、言敦源（言為袁世凱幕友）、沈兆祉（後入袁世凱幕，有小諸葛之稱）、汪詒書、吳順鼎、吳鐵樵、樊鍾等，以及學生林圭、范源濂二人聯名信，方外人有釋敬安（八指頭陀）信，邑人有歐陽師（瓣蘊）、貝元徵、唐才常、劉善涵、李正則等，其中以歐陽師及張通典、黃遵憲、劉善涵四人為最多。」〔註11〕又可證明譚氏與上述多人的確曾有書信往來。這些書信當中，必定有能夠對譚氏的言論、思想更深入了解的文件。是否全都佚失，或是還未發掘？

由此可知，若想進一步對譚嗣同思想有突破性的研究，除史料須再蒐集

〔註9〕見狹間直樹：〈梁啟超筆下的譚嗣同——關於《仁學》的刊行與梁撰《譚嗣同傳》〉，《文史哲》2004年第1期，頁35。

〔註10〕引自政協長沙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政協瀏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譚嗣同紀念館合編，《譚嗣同研究資料匯編》，1988年9月第1版，頁17。

〔註11〕同前註，頁15。

外，勢必得走上史料辨偽一途。除上述《仁學》之外，《全集》中的書信、文章，甚至和記載譚氏相關的第一手史料，都需加以考辨。其中關於戊戌八月三日晚上譚嗣同密會袁世凱之事、譚氏獄中絕筆等問題，都有考辨的需要。所幸這些工作已有學者不憚其煩地從檔案庫、圖書館中，發掘可資參考的重要史料。以譚氏在戊戌政變期間的問題，從 1970 年以來，利用清宮檔案研究戊戌政變的著作，就有包括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孔祥吉的《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楊天石的《尋求歷史的謎底》以及茅海建的《戊戌變法史事考》。相關論文有房德鄰：〈戊戌政變史實考辨〉，收入胡繩武主編：《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林克光的〈戊戌變法史實考實〉、〈戊戌政變時間新證〉等，對研究此一時期譚嗣同的行蹤和行事，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線索。

誠如李喜所指出的：「今後的譚嗣同研究是高起點的研究，難度很大。原因是，開掘新的資料非常困難。而對於歷史研究來講，資料是基礎，無新史料，一切都無從談起。同時，譚嗣同活的時間短，活動有限，著述有限，社會地位有限，可讓研究者馳騁的範圍較小，不會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那樣成為眾多研究者追求的目標。而且，百年來的研究成果斐然，再有所突破，並不容易。從以往的研究看，譚嗣同本身的研究較多，和譚相關的則較少涉及，也就是說不大關注其社會關係的考察。如譚嗣同的家庭問題，其父貴為巡撫，是清末數得上的大官僚，為什麼會出現譚嗣同這樣的叛逆者，很值得研究。譚嗣同個人的家庭生活，也有自己的特色，與他的思想和行動不無關係。家庭對個人的影響，從一定意義上講，遠遠超過了社會。不研究透名人的家庭，就不可能觸及到名人的本質。從譚氏家庭去解析譚嗣同，無疑是相當必要和具有開拓意義的。還有譚嗣同的交友情況，他一生中結交的朋友究竟有多少，這些朋友的狀況如何，對譚的影響在那裡。從研究譚嗣同的朋友去探討其文化品格，定會有新收穫。這方面的研究已有人接觸，但遠遠不夠。譚嗣同的讀書生活，應有專門研究。因為只有真正搞清楚了他一生讀了哪些書，才可以講明白他的思想源流。一般講譚嗣同的思想淵源是儒學、佛學和西學，但具體講是什麼樣的儒學、哪一派佛學、西學的哪些部分，則講不清了。如果弄明白了譚的讀書情況，再把他讀過的書找來看看，上述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註 12〕

〔註 12〕 見李喜所：〈百年譚嗣同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廣東社會科學》2000 年第 1 期，頁 80～82。

李喜所的提示實具有啓發意義，但限於研究者的學力，也僅能就所知、所了解的部分，盡力還原譚嗣同本來面貌的十一，則已不勝欣慰！

